

曾國藩

传

ZHONG GUO GU DAI
MING REN DA ZHUAN

名人大传

曾国藩传

朱亚洲 编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家世与人生	(1)
湘乡白杨坪一户普通农家	(1)
科场功名与人生态度	(3)
京官十二载	(6)
投师门仕途得意	(6)
京师议政除弊利	(9)
创办湘军	(21)
墨经出山练劲旅	(21)
改革营制成新军	(43)
三年困境	(61)
出师不利克武昌	(61)
湖口惨败又奔丧	(76)
安庆之战	(95)
再次出山援浙行	(95)
围攻安庆督两江	(103)
攻陷安庆祝功成	(129)
围困金陵	(141)
三路进兵围金陵	(141)
金陵告破斩头功	(159)
剿捻受挫	(203)
奉命剿捻败垂成	(203)



曾国藩传



师老无功回本任	(225)
星陨金陵	(236)
中兴梦想终破灭	(236)
忍辱求和陨金陵	(248)
是非功过人评说	(265)
从理学家到洋务派	(265)
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	(291)

名人 大 传



最大的就是其祖父。祖父的话，总是响犹在耳：“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曾国藩也总是将祖父所教的为人准则转教子弟：“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后来尊为家训的所谓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和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均出自祖父之口。

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竹亭翁），屡黜科场，应试十七次，到四十三岁才中了秀才。他侍亲至孝，积苦力学，柔而能忍，这些品性都熏陶了曾国藩。曾国藩也受到母亲的影响，他在致弟书中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崛强。”

曾国藩因而逐步养成了自己的资质禀性。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行为是创办湘军，所作所为，就深刻地打下了家世出身的烙印。如，湘军募集，提出专用乡村朴实、诚笃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湘军的选将，提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湘军训练，提出勤字为第一要义，教导部下早起、勤苦、忍耐饥寒；湘军作战，他生平最自夸的是“结硬寨、打呆战”，不辞劳苦，深沟高垒扎营，并竭力倡导“我不知战，但知无走”的顽强态度。这些做法，从个人性格上说，都可以追溯到在白杨坪家中所受的影响。

晚年的曾麟书命儿子国藩写了一幅对联，悬挂在厅堂上，云：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

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钜付儿曹。

曾国藩的前辈们，由农夫而士绅，一生碌碌无为，终老于白杨坪。而他们所倡明的家风，却实实在在哺育出一个能适应古老的农业社会，从而能左右中国政治大局的人物来。

科场功名与人生态度

道光四年，春暖花开季节，曾国藩头一次跟着屡试不中的父亲，从白杨坪乡间走出来，乘船到省城长沙参加三年两次的童子试。这一年，曾国藩仅十四岁。以后一连考了七次，到道光十三年，终于中了生员。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接着人都参加会试。道光十五年，会试不售；十六年，会试再报罢。于是南下溯江而归，因意识到“生平功夫，全未用火猛煮过”，在归途中倾其所有全买了书，回家足不出户苦读了一年。道光十八年会试，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之后是朝考，成绩极佳，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皇上，特别拔置为一等第二名，成了翰林。在翰林院刻苦攻读，几次大考翰詹，连连得捷，到道光二十七年，竟由考试途径一路晋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

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中有一记载：

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摭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日：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不信书，信运气”之言，是有感而发的。曾国藩平日



说过“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之类的话，虽是谦语，但他的天分确实算不上超等。秀才考了七次，会试也考了三次，只取在三甲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然而他却异常幸运地点了翰林，而且在翰院大考中连连得捷。试想，假如他不是早得功名，而是被陷在百无用途的八股时艺中挣扎几十年，那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陋儒，哪有出头之日？又假如他中了进士之后，不是侥幸进了翰林，只是作为短资历、无背景的小京官或外官，靠心血浇灌的政绩来博取拔用，又哪能在短短数年间，凭考试晋身高位，当风云际会之时，以正二品的在籍侍郎身份来组织湘军、号召群伦呢？这中间确实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不信书，信运气”，决非虚言。

名人传

曾国藩在致弟函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信中叮咛：靠得住的只有进德、修业。“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他在致弟书中说：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无来定贤肖的话，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也是贤肖之人了。

因此，要将科名富贵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理道，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



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进取，而是觉悟到：科名里面，有许多虚假误人的东西，又有许多机缘巧合的因素，是靠不住的。人生的意义应大于科名仕宦，因而希望自己的弟弟踏踏实实做学问，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个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人。

曾国藩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人生观改造弟弟们，从这时候起就可看出端倪了。



京官十二载

投师门仕途得意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顺利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




















名人傳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鏞、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鏞“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人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鏞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多年来，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惇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肯去拜见



曾国藩传

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年罗惇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惇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惇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该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駸駸向用矣”。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

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虽然丝毫没有牵连曾国藩，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从此以后，每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他说话，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顺利。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致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名人傳

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就像《红楼梦》中连遭大劫的贾府一样，一下子塌了架子，暴露出老大腐朽的本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却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过来，开始注意世界发展大势，重新考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新的斗争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两广、湖南尤著先声。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的惟一对外口岸，不少物品通过湖南、广西运往广东；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渐次移至上海，广州贸易量减少，昔日运输线上的水手、驮夫等陷于失业。同时，鸦片战争时曾招募大批勇丁，战后骤加裁撤，也使这一大批人无以聊生。另外，这几省历来是会党活跃的地区，他们将走投无路的广大群众串联组织起来，不断发动反抗斗争，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亦



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形势发展最快的是广西。这里土瘠民贫，各族杂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本来就是容易发生起义和变乱的地方；再加上广东的大批失业群众沿江西上，到这里谋生；广东的小股起义军在当地无法立足时也向广西转移。这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形成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时，这里山高水险，地旷人稀，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是清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派到这里的方官亦因油水不多，总想早点调离，遇事敷衍，不愿深究；甚至有意掩饰，蒙混不报。而当地士绅又人少位低，无力与地方官抗衡，不能起到监督作用。这样，在力量对比上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广西的问题，清廷一无所知，地方官放任不问，地主士绅无可奈何，在统治阶级中形成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局面。直到道光三十年夏天，由于不断有人上奏反映，清政府才开始发现广西局势不妙，下令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派号称敢战的湖南提督向荣任广西提督，并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赶赴广西，协助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向荣办理军务。同年十月广西士绅赴京上控，清廷进而了解到广西局势的严重性，立即将郑祖琛革职，派因病乞归原籍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驰赴广西，督办军务。不久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清政府又改派在湖南原籍养病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驰赴广西督剿会党起义。

这时，不仅广西局势如火如荼，广东、湖南不时发生起义，江淮一带和黄河两岸的会党、白莲教等也在积极活动，酝酿起事。总之，全国政治形势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人心惶惶，已呈现出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即将来临的种种征兆。因而



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严重性，并开始筹谋挽回颓势的对策。这些人或者是下层官吏，或者是乡居士绅，或者是中小地主出身的书生，他们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前沿，体验深刻，明了下情，故能最先发现问题，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这类人物遍布全国，各省皆有，而尤以湖南最典型，最集中，其中不少人是曾国藩的好友，多年来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不仅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也时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他们主要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曾国藩赴京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道光十七年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遂成好友。江忠源（1812—1854）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中湖南乡榜，道光二十四年赴京参加会试，通过郭嵩焘求见曾国藩，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江忠源遂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江忠源非常欣赏，书札、家信中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必诚必信的义侠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江忠源非常注意自己家乡青莲教的活动，并暗中组织团练武装，积极进行准备，很快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这就更加受到曾国藩的器重。道光三十年（1850）他奉旨荐举人才时，即将江忠源列名其中。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曾国藩授官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几至不起，多亏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道光二十四年因曾国华与曾国荃欲随罗泽南读书，咸丰元年（1851）起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



曾国藩传

亲曾麟书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同贺长龄的女儿成婚，媒人就是正在贺家教书的罗泽南。曾国藩对罗泽南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赞罗泽南读书明大义，是邑中的颜渊，以不曾会面畅谈为憾。

刘、郭、江、罗以及欧阳兆熊诸人相互之间亦皆为好友。经常保持着联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把地方上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传给曾国藩，又由曾国藩反映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这样，身为二品京官的曾国藩就充当了他们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理人。

曾国藩对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首先，他拥护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是这个政府，为曾国藩本人和家庭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曾国藩出身中小地主，生长僻远山村，如果没有科举制度，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刻苦攻读，都不可能爬上官僚阶层。就他个人来说则尤为幸运，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兼职之多，都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所以曾国藩对清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和效忠之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一介贫窶，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他在家信中又进而表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但另一方面，他对清政府又是不满意的。首先他不满清政府的腐败。他认为道光末年到处造反的严重局面，都是官吏的贪暴和腐败造成的。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这年春天广西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原因时说：“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



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结果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曾国藩至为痛恨的。其次，他也不满清政府对中小地主利益的过多侵害。他在《里胥》一诗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就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和他的这种不满情绪。《里胥》诗写道：“贫者勉自效，富者更可悲。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支，萑萑纨绔子，累累饱鞭苔。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犛，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列举了三大苦情：“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显然这都是为中小地主阶层鸣冤诉苦的。

正是曾国藩的这种矛盾态度，决定了他对清政府的基本立场和对策，即企图针对清政府的种种弊政进行一些改革，以使它变得坚强有力，从而能够担负起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制度的任务。

咸丰皇帝上台之后，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除罢黜穆彰阿、惩办耆英外，还下令征言，命各大臣就用人、行政事宜各抒己见，封章密奏。曾国藩以为时机已到，便在一二年内连上奏章，希图说动清朝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政，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对清政府进行一番整顿。道光三十年他上了两个奏折，一是谈人才的发现、培养和考察；一是推荐李棠阶、吴廷栋、严正基、王庆云、江忠源五人人才可用。但这些奏折呈上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效果，而政治形势却继续发展。不久，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将全国革命形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清朝的政局也为之一变。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的。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中农家